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 嘎叻寨

郑吉平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 嘎叻寨



/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嘎叻寨 / 郑吉平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812-2

I. ①嘎… II. ①郑…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2729 号

## 嘎叻寨

---

作 者: 郑吉平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郭 艳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05 千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12-2

定 价: 32.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那就是我

寨，这是黔西北农村最基本的聚居单元，和别处的庄、屯之类单元一样，是中国农村的细胞。一个寨子少则三五户人，多则人口上千，内中人与人关系或复杂或单纯，野蛮交替着文明，落后夹杂着进步，不足而又知足。

嘎叻寨确有其寨，乃是我的衣胞之地。“嘎叻”是彝族一个姓氏，发音为“á—yōu”。“嘎叻”为寨名，首先，说明这跟“王家寨”“李家寨”一样，彝族文明与汉族文明有相似之处；其次，说明彝族的嘎叻家最先在这里定居，并包容了之后迁徙至此的汉族、白族、蒙古族同胞。

我从出世，在嘎叻寨整整生活了十三年，之后就外出求学、工作至今。离开嘎叻寨三十多年，虽也回去过，但留住的时间却比体验生活都少。回去越少，怀念就越多，最终决定把那段生活写出来。于是，有了这篇二十多万字的文章。

动笔之前给文章的定位为“长篇小说”，写完后——或写作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可能不是，感觉倒像是回忆录或大散文之类。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或许重要，或许也不重要。因为《呼兰河传》的作者、被誉为“三十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曾经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有人（包括茅盾）认为她的《呼兰河传》写得不像小说。我承认《嘎叻寨》缺少小说要素，但我不承认自己对这篇文章缺少感情，相反我认为这里边有很多让我感动甚至也能感动有过类似经历的人的东西，还有让黔西北地域以外

的人能感兴趣的东西，这是让我坚持写完的动力。

文本里面有中国农村变革的历史。文中的“我”，一九六九年在嘎叻寨出世，一九八二年离开嘎叻寨，刚好经历了中国农村一次最重要的体制改革，也即从所谓的“大集体”变革为“包产到户”。文本通过对嘎叻寨社员集体劳动即“出工”以及“我家”遭受队集体迫害的描写和叙述，反映了集体体制对生产力的羁绊，并真实再现了中国农村那一段时期所共有的野蛮、愚昧、贫穷和落后。通过对嘎叻寨人偷偷煮酒熬糖的描写，让人感觉市场经济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文本里面有“黔西北”的地域烙印。有特色的作家，具体而言在于其作品的地域性。由于向往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我当然也想构建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嘎叻寨”。在《嘎叻寨》中，只要能让读者猜得出意思，我都尽量使用黔西北方言写作，有些我认为特别有地域性的方言，我宁愿加注甚至进行解释也没把它换成普通话，更有甚者还要研究一番。对黔西北特有的风俗或文明，包括语言和婚丧嫁娶等等，说实话，我是有点大写特写的。我认为读者能够接受，或忍受。

有时，故事不由自主地，顺便搭乘公共汽车或“二外公”的“拖斗车”发展到城里。我这才有点明白，农村，其实是城市的“根”，或起源。上数三代，怕您的曾祖父也是农村人的。当“大姨妈”和“三舅”从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以后，在父母有榜有样的扶持下，“我”坚持读书也会“农转非”。从这个意义上讲，《嘎叻寨》也是一部农村读书人的“发迹史”。

但我更同意读了初稿的朋友所用“村庄志”一说。在我的故事里，鸡鸣狗吠，山高水长，嘎叻寨的人老死都要往来，永远不变的是泥土气息。无论“四类分子”还是下乡知青，他们在嘎叻寨的故事都让我这个讲述者感到温暖。“刘校长”“苏老者”“高大爷”“卫哥哥”等一群知识分子和一群云南石匠，尤其让我至今感到亲切，他们的教诲和他们的“白话”一样过犹在耳。一条狗哭一匹病死的马，这样的事，绝对只有在当年的村庄才可能发生。“我”与一条狗、一匹马的感情，胜过什么我真的不能说，说不出来啊。文言说（而不是“俗话说”），“十室之邑，必有俊杰”，在我的村庄，就连一个生物都是那么有灵性咧。

父母给我以生命，嘎叻寨给我以灵魂。二〇〇九年六月，我到北京参加了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祖国颂”创作研讨班学习。在隆重的结业典礼上，我作为代表第一个上台发言。我说：“如果，我也能够像巴金老人一样长寿，那么，我一定要写到七十岁，甚至八十岁。我要享受文学：苦难带给我的幸福、眼泪带给我的欢笑！直到有一天，我听见哪怕只有一个农民——我说的是农民——对我说：你是我们的作家！那么，这就是文学对我的最大奖赏！”学员代表发言完后，我们按次序上台，由主席台就座的领导为我们颁发结业证书。刚巧是铁凝主席为我颁证，她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我那句“苦难带来幸福、眼泪带来欢笑”说得真好！整个写作《嘎叻寨》的过程，始终就是“苦难带给我幸福、眼泪带给我欢笑”。

嘎叻当年，就是“我”的“苦乐年华”！

文本里的“我”究竟是谁？那就是我。

感谢生活给了我这部《嘎叻寨》。

感谢中国作协对《嘎叻寨》的扶持。

## 第一章

一九六九年初春，时值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和“保皇派”打得不可开交，叫作“武斗”。

农历二月十一一大早，父亲赶着马车要去县城交货。一马车货物，那是他昨天下黑才从区供销社装来的农副产品，不外乎我们这边特产的生漆、芸豆之类。

我们嘎叻寨在一条乡村公路边，西距大方县城六十二里，东距箐口区公所一十五里。那时父亲赶马车缴副业，从区供销社拉农副产品到县供销社，从县供销社拉日用百货到区供销社。所谓“缴副业”，那时抓粮食生产是“正业”，抓经济收入是“副业”，绝大多数劳动力抓粮食，极少数人抓票子。生产队规定父亲每年缴回三百五十块钱，要是是一年不止挣这么多钱，结余部分就算们家的自有收入，但如果一年挣不到这么多钱，也必须缴这么多钱，那样的话，就只有卖点粮食或者什么的了。

父亲昨天从县供销社拉了一车日用百货到区供销社，接着就从区供销社拉了一车农副产品回嘎叻寨来，歇一晚上，今天一早出发，往县供销社拉去。

母亲怀我整整已是十月，算来分娩的时候差不多了，父亲自然恨不得一去就回。去县城一路无事，但当他装了一车日用百货往回赶时，在离城十里一个名叫五风的地方，正好赶上一场武斗，“造反派”和“保皇派”人数各有不下百人，绝大多数是农民，就在马路上打群架，弯刀镰刀，锄头斧头，平时用来劳动的生产工具都变成了称手的武器，打得好些人头破血流。农民不好好种地，天天斗来斗去，可想而知，那年头生活不困难才

怪。当时父亲见了这种阵势，一是路被武斗的人堵了过不去，二呢，也不敢过，那些斗红了眼的人全都没有理智了的，万一他们哄抢车上的货物，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挖你一锄头，那可冤枉，就将马车掉了头，暂时回城里避过这一仗再说。

外公外婆膝下无子，只有三个女儿，们母亲是二姑娘，母亲的姐姐也即们大姨妈嫁在县城，母亲的妹妹也即们三舅在专区医院工作，在那粮食紧缺的年代，相反农村生活比城市还要有保障，所以外公外婆住在们家。也就那天晚上，外公做了个梦，梦见一条红冠大蟒爬进我们家来。他顿时惊醒。鸡叫三遍了，父亲还没回来。因梦里的大蟒头上红红的，外公就担心，是不是们父亲的脑壳被人打出血了。可那时没有手机，父亲是什么情况根本无法了解，也只有提心吊胆地等待。天亮后，五凤武斗打死了人的消息被路过嘎叻寨的人带了过来，一家人无不忧心忡忡。

当天上午九点还是十点，母亲说那是“小早饭”时候——我出世了。中午，父亲平安地回到了嘎叻寨。外公重新思索昨晚那个梦，说，唔，这个梦怕是应在老五身上。一九六九年属鸡，而外公梦见的大蟒头上有一只红红的冠子。

老五就是我。

一天，小学的夏老师挑水经过们家门口，听见我哭得厉害，便放下桶进屋询问。母亲告诉她，因为乳汁不够我吃，所以饿哭。那时夏老师有一个比我大几个月的男娃，她正要给他断奶，奶不断了，从此天天给我喂奶，两个母亲共同哺乳这才使我度过乳荒。

二哥一天两回背我去让夏老师喂奶。

当年们兄弟五个，大哥十二岁，二哥七岁，三哥五岁，四哥三岁，我零岁。大哥到箐口中学读书去了，背我去吃夏老师乳汁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二哥背上。七岁，二哥上学了，放早饭学回家背我去喂一次、放晚饭学回家背我去喂一次。

街上到学校是一条没铺碎石的马车路，从寨北头公路拐进我们街上，向南而去，从公社和分销店之间出街。这条马车路走啊，走，走过学校背后，再走，走，蛇一样走进一群绵羊一样的山峦，不知走到哪儿去了。

虽然春天，乍暖还寒。母亲用一匹布带，像数学符号一样把我“乘”



在二哥背上。我穿的开裆裤，见我屁股白白胖胖，母亲少不得又怜又爱地揪上一爪两爪才放他们走。幼童的体重，嘎叻寨是忌说轻重的，比如，这娃好重，这娃好轻，是不能说的，而要说成：这娃颗粒大，这娃颗粒小，这娃的颗粒不大也不小。农村人嘛，把孩子当成粮食，抑或种子。我的颗粒大，二哥个子小，坠得背带都勒进他有限的肉里去了，就反剪双臂，用手掌托着我两扇磨盘般屁股。如此将我“托负”去给第二母亲的途中，们两弟兄的肉互相温暖着对方。

桃红李白，嘎叻寨如在画中。

原先，嘎叻寨的寨内寨外，树木成林，这儿一家人，那儿两家人，就像童话里的木屋隐藏在大森林里一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的“老大哥”，苏联，因为不认中国这个兄弟了，断绝对我们的钢铁供应。新中国成立初期什么也没有，要造枪炮以防战争，要造机器发展工业，要打锄头镰刀发展农业，毛泽东主席大手一挥，离了红萝卜就不做八大碗吗，我们自己炼！

武器精良的八百万“国军”被我“小米加步枪”打得落花流水，蒋委员长躲到台湾岛上都不敢回来，所以在主席看来，没什么做不到的。那时钢铁最多的国家第一数美国，第二数英国。老大哥不讲义气，主席老人家非常生气，发狠道，我们不仅要自己炼钢炼铁，而且我们钢铁的数量要超英赶美！于是，“大跃进”被们伟大领袖提出来了。

为了“大跃进”，我们是全党动员，全民参与，从城市到农村，有着正规设备的冶炼厂也要炼，挖一个土炉也要炼，大方城在炼，嘎叻寨也在炼。会炼铁的师傅，们嘎叻寨叫他“钩匠”，这类人才农村本来就少，真恨不得像挖洋芋那样，一锄头挖下去就刨出一大堆钩匠来。

由是，寨里寨外的青桐树、毛栗树，都被就近砍来烧火炼铁了，房前屋后只剩一些核桃、板栗和桃李梨杏之类的果树。当然，还有竹子、棕榈。漆树可不敢烧它，烧出来的火烟一沾着人，人就要生漆疮，奇痒难耐，所以漆树也在。据说当年日本人曾经打到们贵州来，被一种草，们叫它癩藿麻，茎和叶上的细小白刺，“癩”得他们又痛又痒又麻，“八嘎八嘎”地说，贵州这儿连草都惹不得，急忙撤走。您还别说，真要打起仗来，贵州真是草木皆兵，日本人才一惹上癩藿麻就跑，算他明智，再不

走，惹上漆树更吃不消，那时，他一刀将自己扎死倒还痛快。

落后就要挨打。如果谁提出，要生态而不要生命，不用毛主席动手，我都亲自扇谁两大耳光。

从街上到学校，路旁到处是磨盘一样的树桩。二哥肩膀酸了，将我的屁股随便往哪个树桩上一蹶，歇肩气再走。别看嘎叻寨的这些树桩烂糟糟的，说不定，它上半截身子早就打过鸭绿江去抗美援朝了，弄不好，我是一屁股坐在“国际主义”的底盘上。春来二三月，运气好一点的话，二哥一反手能从树桩上抓到几朵肉奶奶的香菇，回家敷一点盐在火上一烧，味道好极了。

多么壮烈的树啊，上半身化为烈烈的大国气节，下半身行将腐烂还在奉献鲜美的味道。

途中要经过一所无主坟（多年没人扫墓挂纸），传说坟里有一个“囤箩鬼”，到了坟边二哥一般是一口气跑过，仿若日本人看见了癞藿麻。但接着路边有一口水塘，有时，也就是暖洋洋的春日照得塘水温嘟嘟的时候，塘里的鲤鱼时不时会蹦出水面，如果见鱼跳了一次，二哥准会停下脚步，直要看到鱼儿再跳一次，或者，我的哭声急了起来，这才急忙朝学校走去。什么“超英赶美”，什么“国际主义”，当夏老师把乳头塞进我的嘴里，我就什么也不想了。

——我竟想？天才！

布谷鸟，嘎叻寨唤作“告谷”，们模仿它的叫声，也不是“布谷布谷”，而是“告谷告谷”。二三月间，当它开始在空空的田间地头声声催犁，们俏皮地对它说：

“晓得喽——告谷！告谷！栽包谷栽包谷！”

农村季节，是在鸟声里变化的。

年年告谷开嘴叫，年年开始栽包谷，嘎叻寨亘古如此。鸟儿生死更替，叫声还是那个叫声，季节四时轮回，映山红开了照样春来，但我们的生活，就在一九六九年春天发生了变故。

我天生能吃，尽管母亲和夏老师两个人给我哺乳，还是填不饱我。那天，父亲赶了一天马车，母亲出工栽了一天包谷，简单吃过晚饭要休息了，我却哭着不肯睡觉。母亲晓得我这是饿的，就拿铁勺顿在火上炒了几

颗包谷，准备研成粉末拌面糊喂我。

生产队一个干部正巧从窗外走过，大概他听到了炒包谷的响声，或许并没听到，只是想从破窗纸的缝隙里看看这家人为什么还没熄灯睡觉，总之，不管有意无意，这名队干发现了母亲在炒包谷。

他当即破门而入，大吼一声：

“拿到偷包谷种的人了！”

只怪那种年月粮食太少，多数人吃不饱饭，因而下种的时候，有人会悄悄匀几颗种子揣回家里。队干们不知是发觉种子少去，还是算准有人会偷种子，居了心要揪偷种子的。但其实母亲给我炒的这几颗包谷，是她从们家口粮里留来栽自留地的。家家都有自留地，们家也有，粮食再少，母亲也要留点包谷种子栽在自留地里，以便秋来多少也收几个包谷。再说母亲最要面子，断不会冒着当场捉住被羞辱的危险偷集体种子的。可是，饿了就要偷粮食，似乎成了当时的真理，所以，即便父母长着一千张嘴，怎么申辩人家也不肯听。

不多时，闻讯又来了两三个队干，几人一合计，就满屋子地翻了起来，说，看韩朝珍究竟还偷得有多少包谷藏在屋里。如果说才到春天们家就一颗包谷也没有了，全家人岂不等着饿死，所以们家屋里当然有包谷，被他们翻出来了，硬说是母亲偷的，就要没收。父母与他们争执，他几个便老羞成怒，拆的拆门，掏的掏窗子上残存的玻璃，更有一个干部看中了母亲当年的陪奁，那是一口红漆木箱，总之，但凡他们看中了的东西，通通都被他们强行抄走。

这还不算，第二天，生产队召开队委会，少数服从多数地通过一项霸王决定，让父亲赶着马车到遵义去拉工程，让母亲到六七里外的大青山牧场开荒种草。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说，某队长家门上的那块门板是们家的，某会计家窗子上安的玻璃，有两块是们家的，某队委家柜子上的那口红漆木箱，也是们家的。我颇为不解，我们家的东西为什么会走他们家去？父亲幽默地解释，我们分集体的粮食，他们集体分我们的家呀。

也亏父亲想得开，要不然，当年我们家被撵上牧场，自己都把自己气死了。牧场的位置比嘎呦寨高一两百米，父亲送们上山，一边走，他一边

自我解嘲：

“好，好。们家步步高升了。”

大青山牧场是一个综合性的养殖场，们到来的时候，在四五个白土丘陵上，生就平坦的地方已经长出人工播种的牧草，而山腰上新泥裸露，刚刚垦出几层梯田。母亲此来要做的事，就是跟那些先于们上山的社员一道，伐木垦荒，让梯田爬到山顶上去，直到梯田里面，也长出人工的牧草。

在一处有水，而且地势较为开阔的山沟里，依山修着几排梯次排列的、窑洞一样的石圈，一间挨着一间，一层擦着一层，怕有上百间吧，至少得有几十。有的圈里喂猪，有的圈里喂牛，有的圈里喂羊，更多的圈里什么也没有喂，要等这四周所有的山头都长出草来，这些暂时空闲的圈，才能装满。

隔着一条清亮的山溪，圈群对面有几栋住满了人的木屋，里面有场长，有会计，有其他管理人员，有养殖人手，有垦荒植草的。们是挨撵上山来的，挤不进这些公房。牧场西南的坡头，杉树林里有几家人。不知那是场长还是副场长，总之是个彝族妇女，高高大大，泼辣干练，山歌飞得过几面坡，喝酒喝得翻同志哥，她帮们在这几家人里协调，最终，一户彝族农民腾出一间屋子，由们借住在他家里。

悲剧，就发生在这个几户人的小寨。

那时的人饿得很啊。们上山来的那天，路边就饿死了一个人。上山的小路，被密不透风的蕨草——们叫它“狼茛”的那种，遮得几乎看不见路。正走间，母亲的小腿忽然被什么抓了一下。那时山深林密，深山老箐的，老虎豹子不知还有没有，但一种叫“豺狗”的野狗多得很，性情跟狼差不多，饿极了也会吃人。母亲最怕遇上豺狗，一路上心都悬着，吃这一抓，吓得腿一抽，“妈呀”一声惊叫，心子仿佛从喉咙里飞出去了。父亲却以为母亲被蛇咬了，正待一棍子抽去，却见草丛里伸出来的是一只人手，再看，狼茛里躺着一个男人，奄奄一息。

这男人气若游丝地说：“救命……”

父亲问他：“你怎么了？”

男人说：“饿……”

父亲说，你再挨一下，们上去给你找点吃的来。

去牧场要经过那个几户人的寨子。春荒，吃的很难讨到，但听说有人快饿死了，寨里一户人家还是给了父亲两个洋芋，让父亲赶快拿去救命。可是，父亲回到那儿，发现那人已经落气了，一只张开的手掌伸在蕨草外面，到阴间讨吃去了。

更为可悲的是，那户拿出两个洋芋来救这男人的人家，两个儿子同样因为饥饿，也死了，死得比这人更惨。

在牧场，畜牲的日子比人好过。我的母亲，为它们垦了一天梯田，没哪顿吃饱过肚子。甚至于，那些把它们一个个喂得肚子滚圆的人，肚皮同样瘪喇喇的。几百年前有人就说，“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几百年后这些人，又何尝不是眼鼓鼓地看着他们喂出来的那么多牲口而一个也不能吃。它们，是要运往那些叫“城市”的地方，给手握“肉票”的人吃的。那家人的两个儿子，因为竟敢就在这里吃，所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两弟兄实在太饿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两弟兄偷偷从圈里抱了一头小猪，准备回家杀来煮一顿吃。才偷到手，就被发现了。如果他们肯放手，或许幸免一死。但后面追来的那些要保护公有财产的人，尽管他们喊声震天，可两弟兄就是不肯放下猪崽逃跑。他们追得越急，他们就越是豁出去了。死也吃一口肉！两弟兄干脆懒得跑了，一刀剖开猪肚皮，抓了猪肝就吃……

母亲回忆，那个漆黑的深夜，两弟兄被一顿乱棍打死之后，嘴里还各自含着一块来不及下咽的猪肉。

母亲待字闺中的时候并没干过重活。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从她嘴里慢慢知道了一些外公家的情况。原先，在外曾祖父手里，外公家还算殷实，传到外公手里后，都还可以的，但后来由于外公生病，土匪打劫，家道这才日渐没落。母亲童年及近少年，家境还好，女儿家，所以外公没让她们三姊妹干啥重活，可以说连锄头都不会拿。可是，嫁到嘎叻寨后，情况不同了，父亲是长子，作为长媳，不做活路不行，所以啥活都学会了，肤色渐渐黑，声音渐渐粗，手上长出了老茧，完全变成了一个劳动妇女。

到牧场后，又不比在队里出工，干多干少工分一样，干好干坏工分一样，而是以开垦梯田的面积折算工分。但别说梯田不好造，就是荒也挺难

开的，而且母亲是背着我干活。开荒叫作“开生地”。大概耕地叫熟地，板地叫生地。坡上荆树丛生，先把它们砍开，叫作“砍猱地”。猱地，猴子的地盘吧？砍树，砍灌木，砍荆棘，是很苦的活儿，但还算简单。最难做的，是起疙疸。我们说的“疙疸”，即树桩，起疙疸就是把树桩从板土里挖掉。板土，我们叫“死泥”，想想就知道，坡上从没动过的泥土板结得都有多紧，而树桩的每一条根须都是往泥土的深处伸的，像手一样牢牢地抓着越深就越紧的泥土，再想想，就知道起疙疸多么费劲。

疙疸起多了，母亲竟然成了起疙疸的高手。领着开荒的小队长是个风都吹得倒的瘦小男人，开荒开到有疙疸的地方，一时除不掉，就说：“韩朝珍，你来！”母亲经常帮他起疙疸，虽然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小队长还算仁义，工分没少算给母亲。队长说，韩朝珍，你起疙疸怎么就这么简单呢？

其实，起疙疸并不需要什么尖端的科技，只消找出它的每一条根，一一地斩断，疙疸也就失去依附。嘎叻寨所谓“人怕寒心，树怕翻根”。但树根藏在泥土下面，其他人找它，得冤枉地挖掉好宽的泥土才能发现，只有母亲，能准确地判断出它们的位置，几锄下去就能见到，母亲甚至不靠斧头，用锄头就能把它们斩断。

但母亲却认不得蘑菇。粮食肯定不够吃的，好在入夏雨水丰沛，坡上遍地蘑菇，可以采蘑菇吃。蘑菇红红绿绿，种类非常多，可并不是每一种都吃得，很多是有毒的，吃多了能够把人闹死。母亲犯错不是一回两回，但上一回采了毒蘑菇，下一回还采，怎么也记不住哪种蘑菇有毒，哪种无毒。人家教她，说，你实在辨识不了，吃蘑菇的时候就多吃点大蒜，大蒜可以克毒。可是母亲不肯吃蒜，怕辣，嫌臭。饿得最厉害的一次，母亲见着蘑菇就采，采了一撮箕，通通煮来吃了，结果中毒至深，以至产生了幻觉，据她清醒以后回忆，看见一大群鬼把她围住，獠牙长舌，嘴上沾满吃人的鲜血。但不知母亲是记不起来呢，还是支吾我们，说，们几弟兄没被毒蘑菇坏过。

秋来，靠山公社变换了书记。因为新书记和外婆一个姓，外婆跟他说了个人情，我们终于离开牧场，回到嘎叻寨居住，母亲照原参加生产队劳动，二哥照原上学。

三哥还没上学，母亲出工、二哥上学后，看家、背我、照看四哥的任务就是他的。晚上的时间，母亲一边浆洗或缝补，一边教我们唱儿歌、背毛主席语录，或者给我们摆白话。

那时候，毛主席的话叫“最高指示”，农村劳动生活都要以他老人家的话为依据，学校里教育二哥他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记得“毛主席语录”是一本红塑料壳的小书，毛主席最重要的话都摘录在这本书里。可能整个中国，但凡有人的地方都有这个“红宝书”。如果生产队长心血来潮，突然要谁背一段毛主席语录，谁背不出来那一天的工分搞不好就被扣了。母亲从没进过一天学堂，但书上的东西听别人说过一遍，基本就记住了，竟没吃过这样的亏。

五弟兄就数四哥聪明伶俐，四岁不到，背毛主席语录比二哥三哥还厉害，母亲教他一遍，就背得出来。四哥还会在母亲苦闷的时候，及时背一段毛主席语录逗母亲开心。四哥是那么招人喜爱，谁见了都想抱起来亲他几口，连公社书记都说，赵老四长大以后要“做事”。

可是，四哥竟没长大。

街上到学校的路边那口堰塘，我们叫它小堰塘，是小孩子经常玩耍的去处。母亲不在家了，三哥背上背一个、手上牵一个，带四哥和我去塘边钓鱼。钓的鱼都养在屋后，三哥在屋后的老桃树边挖了一口小池子，装了一池水来养鱼。

小堰塘是集体砖瓦厂采泥采出来的一口泥塘。说来也怪，这口塘没有水源，也没有消水洞，但自从天雨把它装满以后，无论多么涝，无论多么旱，不盈也不涸，而且竟然生出鱼来，全是鲤鱼，有青鲤，还有红鲤，水不深，当鳊水的人特别多的时候，或热天的清晨傍晚，鱼们还会扑通扑通跳出水面。

三哥还没学会鳊水，就在塘坎上钓鱼。说是钓鱼，却不用鱼钩。三哥蹲下，把手伸进水里，注意别掉进塘，在岸壁摸个螺蛳破掉壳，将螺蛳肉穿在树枝上，伸进水里给鱼吃，悄悄把它们往潜藏在水里的一把撮箕里引。一大帮鱼追着螺蛳又咬又扯，三哥明显感到他手里的树枝被震得直颤。把鱼群引到撮箕上方，三哥另一只手悄悄把撮箕向上抬、向上抬，临到水面，呼地一下抬出水面，只见来不及逃走的鱼们，在撮箕里活蹦乱

跳，是有点上当受骗的气急败坏。

三哥把鱼捉进小木盆，兴味盎然地继续——与其说是钓鱼，不如说是澹鱼。而四哥蹲在盆边，看鱼儿在盆里摇头摆尾地游来游去，也煞是欢喜，总忍不住伸手去捉。三哥发现，让他别捉它们，说鱼儿沾了手汗就活不长了。但四哥哪里忍得住，老是捉，结果是衣袖湿透，晚上发起高烧来。

四哥一直烧到第二天还没退烧，母亲就找了点草药喂他。母亲责骂四哥，文子，你为什么要玩水啊！四哥见母亲生气了，怕挨打，赶紧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来哄母亲开心。傍晚，母亲收工回来，四哥烧得更厉害了，烫得就跟一块红煤一样。烧得四哥十分难受，把母亲的脖子箍得紧紧的。母亲慌了，说，文子，妈妈马上带你上箐口街上找医生！

可是，母亲背着四哥，亦跑亦走地刚刚去到火烧寨，离箐口还有五里地，四哥就永远离开她了。那时外公外婆已经回猴子山。外公有病，外婆是小脚，均不能劳动，而父亲不在，们家生活愈艰，两位老人不肯给母亲增添负担，所以回家去了。四哥夭折，母亲归咎于孩子缺乏大人照管，所以去猴子山再接外公外婆来照看我们。其实外公外婆的生活又何尝不要人照顾哪，母亲把双亲接来，也是怕他们饿死在家都不晓得。

外婆终于没发现四哥，就问母亲，老四呢？母亲一听，一下子昏死在们外婆怀里。

“七月七千，八月八万，九月成堆，十月解散。”这谣说的是，七月间到十月间的苍蝇。那种个头小、爱在食物上停留的苍蝇，们叫它们“饭蚊”，惯称“蚊子”。四哥奶名文子，自从他发高烧夭折以后，母亲一看到蚊子就会想起他来，絮叨：“十月解散，十月解散……”

父亲有文化，四哥的名字他用的是文化的文，期望他做个有文化的人，但母亲没有文化，还以为是蚊子的蚊。这不能怪母亲把自己的儿子当成滥见的生灵，其实农村父母给孩子起名，的确爱借用鸡狗猪鼠，寄希望于孩子像它们那样，适应环境，生命力强，在们嘎叻寨，就有母鸡、母猪、白狗、骡子这么些人的乳名。自然的，和母亲一样没文化的人，也会以为四哥的名字是蚊子。

以前母亲是烦蚊子在她睡觉时爬她的脸、吵她的瞌睡的，但是自从四



哥没后，她不仅不烦它们了，还会跟这些小家伙说话：“蚊子，你们是我家蚊子啊……”

九月间，没盖严的锅里、甑子里，没洗过的碗里、筷子上，蚊子一堆堆一串串的，要是以往，母亲会一边用饭箸撵它们，一边说：“人都不够吃，你们还来争嘴！”可四哥不在了，母亲不了，她望着它们，眼里是柔柔的母爱，喃喃地说：“吃吧，吃吧，肯吃肯变，们家蚊子快吃快长！”

二哥或三哥，“啪”，一巴掌拍掉一只蚊子，母亲会猛地一个冷噤，尖叫道：“打它做什么，难道它不是条命？”样子很凶，他们谁见了谁怕。

毛主席语录是一本六十四开的小书，红塑料封皮，所以又叫“红宝书”。封面印着一个圆圆的毛主席像章，像章四周光芒万丈，即便母亲没有文化，也明白这个图案的意思：“毛主席，像太阳。”四哥在时，会唱《东方红》给母亲听：“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还会学母亲的样子，举起“红宝书”一挥一挥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万岁、万岁！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寿无疆！”

母亲想起这些，就会不自觉地拿起语录本，失神地唱起《东方红》，虚脱地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

有时，母亲正在和社员们一起干活，比如坐张小板凳，膝上架把筛子，扒拉着筛子里的豆子，正选得好好的，忽然手就停了，侧起耳朵仔细地听。问她听什么，她摇摇手示意别吵，头侧得更厉害，倾听得更认真，似乎有某种声音，正渐渐地离她远去。结果，母亲失望了，还回到原来的姿势，继续扒拉豆子。问她，韩朝珍，你刚才究竟在听什么？母亲无比怅惘，失魂地说：“我以为我家蚊子喊我……”

终于有一天深夜，母亲从睡梦里一声大哭醒了转来。

“赵兴尧！”她号啕地对远在遵义的父亲说，“你叫我咋个向你交代嘛……”

这一哭，母亲憋闷在心里的淤气才给运了出来。要不然，郁郁而怎样，我们想都不敢想，否则，谁在以后照管我们？也许，是母亲她自己忽然清楚：失去一个，还有四个，我不管他们，谁管？